

故事、历史与情感：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实践路径^{*}

陈三宝

内容提要：主流意识形态与叙事相结合，是通过叙事方式实现讲道理的意义建构。故事叙事、历史叙事与情感叙事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重要方式。在故事叙事中实现以事寓理，要借助故事隐喻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意象性，运用故事结构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形象性，借用故事话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生动性。在历史叙事中实现学史知理，要讲述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厚重感，阐释历史发展的事实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解释力，唤起历史记忆增加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说服力。在情感叙事中实现由情入理，要以情境渲染强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以情感互动增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共识，以情感表达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共鸣。

关键词：主流意识形态叙事 故事叙事 历史叙事 情感叙事

中图分类号：G206；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2025）03—0122—10

DOI：10.20003/j.cnki.xjshkx.2025.03.011

作者简介：陈三宝，法学博士，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广州 51063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明确了叙事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方法论意义。叙事是“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记载下来”，但不仅仅是“就事论事”，而是基于对具体事物的过程性、生动性和形象性的叙述，实现事件承载道理的目的，即“以事明理”、“以事言义”、“以事言道”。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即通过叙事来说清楚主流意识形态。具体而言，一是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是以“事”为载体说清楚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对事件发展过程的描述形成具有连贯性、情节性和意义性的故事，以故事来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给人审美快感的同时予以思想的启迪；二是主流意识形态生成于社会现实，现实存在呈现为事实，过去的事实就是历史，讲清楚主流意识形态要将其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增添理论解释的厚重感与合理性；三是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是主体双方交流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展开要合情合理、通情达理，“理”即理论认知，是核心内容，“情”即深情厚意，是情感催化，真理力量加上情感力量，能有效实现理论认知和价值认同的转换。因此，故事叙事、历史叙事与情感叙事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重要方式。分析与阐释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故事叙事、历史叙事和情感叙事有机结合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对于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力，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故事叙事：在故事化叙述中实现以事寓理

故事叙事日益成为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与认同的重要方式。理论能够说服人，不仅在于内容上“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且要在形式上抓住人的注意力，符合人的认知规律。这就涉及到如何将特定的理论知识转化为人民大众可接受的道理、事理和情理。故事叙事成为理论转换的重要一维。主流意识形态故事叙事是借助故事载体表达理论，使理论更具形象性、意象性和趣味性，从而将主

^{*}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三大体系”建设研究专项“加快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研究”（GD24ST03）、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课题“‘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叙事研究”（2024GZGJ163）的阶段性成果。

流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表达体系与受众的认知体系有机结合，实现故事承载道理、以事寓理的效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各种精彩、精炼的故事载体，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寓于其中，使人想听爱听，听有所思，听有所得。”^①

（一）借助故事隐喻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意象性

隐喻在语言系统中具有认知与建构功能。通常，隐喻通过描述特定的意象，唤起与之相关的语用体系，既增强语言美感又与人的认知系统相关联。故事叙事借助类似或关联事物隐喻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将主流意识形态化抽象为具体、化晦涩为生动、化理性为感性，推动人们在听故事过程中自然而然建构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

借助故事叙事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隐喻。隐喻是以其独特的修辞方式建构重要的概念认知路径。作为一种修辞方式，隐喻为意义转换提供了修辞手段，是人们认识事物的认知思维方式。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字是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用类同字。”^②可以说，“隐喻的实质就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某一类事物”^③，是“由此物到彼物”的认知，涉及“本体”和“喻体”。本体和喻体是两种不同的事物，但彼此又具有相似性和相通性。“隐喻是以喻体和本体之间的相似性作为意义转移的基础的”^④，是通过对喻体的认识来说明本体的意义。通常，喻体是为人所熟悉的、具体的、认知难度低的事物，本体是不易为人所理解的事物，运用隐喻可以将抽象事物具体化、未知事物已知化、困难事物简单化。这样，隐喻揭示了人类认识活动的概念化过程，人类的认知可通过隐喻来建构。当概念或理论面临解释困境时，隐喻的功能便不断凸显。通过运用隐喻修辞方式形成本体和喻体的类比联想结构，以喻体的意义系统来建构和把握本体的意义系统，从而帮助人们通过具体、形象、经验的事物来认知抽象的范畴性事物。

隐喻修辞突破了语言形式的局限，推动意义在不同事物与范畴间映射与生成，不断进入主体的认知层面，实现主体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尤其是置身现代化背景，“视觉时代”的来临推动世界被转化为“图像世界”，“世界图像化”从文化意义上体现了事物的具象化过程，也体现了人的认知方式转变为更加注重具象化、具体性、生动性的事物。故事叙事作为一种文化隐喻，不仅意味着可将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叙事性表达和具象化呈现，而且意味着一种通往主流意识形态抽象概念的认知方式。概言之，故事经过层层编码并非指向故事本身，而是故事背后的文化隐喻，推动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可听”、“可看”的存在物，发挥着表达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

（二）运用故事结构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形象性

主流意识形态故事叙事的形象性是通过“结构”来彰显。结构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故事结构是运用情节、视角、因果等方式将人物、事件、情境、动作、对白等要素排列组合。故事结构是故事语义分析的模型，也是故事得以展开的框架。普罗普从 100 个俄罗斯民间故事中抽出 31 个功能项，认为故事就是建立在功能项的排列组合之上。列维-斯特劳斯在将语言结构归纳为音素、语素和义素的基础上，提出神话是由“神话素”或“更大构成单位”组成，并进一步阐明，这些构成单位“不是一些孤立的关系，而是一些关系束，构成成分只能以这种关系束的组合的形式才能获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212 页。

② 〔古希腊·古罗马〕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年，第 73 页。

③④ 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29、44 页。

得表意功能”^①。从这个意义上讲，故事结构是故事生成的结构化方式，是故事意义和故事效果生成的作用机制。有效运用故事结构，将价值理念融入结构之中建构故事世界，形成强大的故事形塑力，从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说服效果。

情节增强故事吸引力，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说服的艺术效果。情节，或可被视为某种话语成规，其目的是赋予故事戏剧性、故事性、有趣性和意义性。亚里士多德肯定了情节的优先地位，并指出“情节，即事件的安排”^②。事件的安排要具备整体性，即有头、有身、有尾，完整事件的起讫及故事运行的逻辑内蕴了严密的情节安排。故事借助情节构成一个有意义和有意思的整体。任何故事结构的布局都是讲故事人的匠心设计，故事的展开会根据情节的效果加以安排。情节设置通常以悬念和角色矛盾形成“突转”、“变化”，产生故事性和戏剧性效果，从而调动人的神经系统，引发人的好奇需求，引导人在步步追问中反思故事意义。“悬念以表现顺序（而不再是系列）的不稳定性的方式，完成了语言概念的本身。因此，‘悬念’抓住人的‘精神’而不是‘内脏’”^③。受众不断跟随悬念的设置，连环套问“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剧情，从而将自身放置到整体的故事脉络中，感悟故事、领悟故事意义。可以说，故事情节越精彩，受众越能进入故事之中，故事也就越向受众展开意义空间，发挥故事的价值建构与引领作用。所以，主流意识形态故事叙事要充分运用故事情节的审美价值，通过各种趣味性故事转换主流意识形态抽象而复杂的理论概念，调适过往的硬化与空洞化教育，实现以小故事承载大道理的效果。如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铁原阻击战”为主线，通过动人的英雄故事使受众沉浸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将个人情感与家国同构、历史记忆有机关联，推动受众在重思历史故事中感知爱国主义和抗美援朝精神。

时间—因果机制将不同事件相互凝聚为整体性故事后赋予目的意义，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叙事说服效果。故事叙事不是孤立看待现象或事件，而是将故事置于一定的时空背景中，置于与其他故事的关联中，在各种关系中辨识故事的意义。罗兰·巴特认为，“实际上有一切理由相信叙事能动性的推动力，在于时序连接性和逻辑连贯性之间的含混性本身，故事中在后出现者有如被造成者。”^④可以说，时间—因果机制将人物与事件凝聚为整体故事，顺着时间—因果链条，不断延伸出故事意义。离开因果关系，时间序列中的事件要么被孤立，要么成为随意的堆砌。离开时间关系，故事无法被讲述。这样，故事的时间和因果相互交织，构成事件之间有时序、事件之间有因果。每一事件都与之前的事件相连并指向未来的事件，所有事件联系起来，故事背后的意义就得到了有效阐释。也就是说，不同事件加以时间—因果序列之后使故事具有开始、发展、转折与结果的内涵，以及序列、脉络和对比的意义，能够增强故事表达的艺术效果，推动主流意识形态深入人心。由新华社音视频部出品的纪录片《一亿人的脱贫故事》由《百年使命》《寻路中国》和《奋斗众生》三集构成，在时间上部分故事紧扣“脱贫之后”美好景象，以倒叙和设置悬念方式形成“何以如此”的叙事效果，或通过顺序方式以村民真切真实经历说明脱贫前后的生活与精神变化，产生“接下来如何”的叙事联想；在空间上故事不局限于一地一村一人，涵盖基层扶贫干部、致富带头人、贫困户等群体，涉及产业扶贫、异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生态扶贫、健康扶贫等领域，边讲述故事边阐释政

① [法]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26 页。

② [古希腊·古罗马] 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第 21 页。

③ [法] 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载张寅德编：《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36—37 页。

④ [法] 巴尔特：《符号学历险》，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16 页。

策与脱贫经验，将故事空间不断延展，从而通过时间—因果机制的艺术处理，说明脱贫攻坚故事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三）借用故事话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生动性

故事话语之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话语的修辞维度。叙事本是故事和话语的结合，故事是叙事的内容，话语是故事的言说方式。无论是“讲好中国故事”还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在一定程度上都离不开故事话语的表达，即话语修辞的作用机制。实际上，在论及叙事基本问题时，学界早已肯定了故事话语的重要作用。柏拉图将叙事视为“讲故事的话语方式”。热奈特将叙事界定为故事、叙事（话语）、叙述行为三个层次，并强调在表现话语上，叙事必须具有叙述性话语。查特曼遵循结构主义方式，指出叙事由故事和话语两部分构成，故事是内容或事件的链条，话语是内容被传达的方式。可以说，故事话语具有不同于抒情话语、陈述话语、议论话语的独特性质，正是故事话语的存在使故事具有表征意义，也使故事叙事成为一种“有意义的结构”。在主流意识形态故事叙事实践中，故事依存于话语之中，因话语形式的改变而改变，依话语形式的表达而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被建构与认知。

故事具有不同的言说方式，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话语形式。在建构故事叙事方式时，就是在探索“如何讲”的过程，也就进入了故事叙事的修辞维度。故事话语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是通过“讲故事”方式实现“讲道理”的意义建构。故事构成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主体内容，故事话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修辞手段，从而为从故事通往理论架构了桥梁。可见，故事话语发挥着媒介功能，即以故事为媒，通过对已“存在”的故事进行编排与表达，形成结构化和形态化的故事，为人们的认知和理解提供重要工具。故事话语涉及到话语的表达艺术，也就是语义规则的策略性应用。随着智能媒体的推广与应用，故事话语突破了传统以语言符号为基础的话语模式，使故事不再封闭于单一媒介形式，形成跨媒介叙事，促成新的话语生成模式。跨媒介叙事不仅是各媒介间的技术融合，而且是技术、内容、受众与意义等各要素的结构性融合，其借助电影、电视剧、游戏、短视频、微短剧等形态，以戏剧化场景、沉浸式体验、多媒态呈现等方式构建立体化、整体性故事或连续性故事系列，使故事成为激发受众认知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相较于传统故事话语而言，跨媒介叙事更加智能化、游戏化、图像化和互动化，从根本上拓展了故事话语的语言体系。因此，主流意识形态故事叙事要充分考虑不同媒介载体在符号编码与传递信息中的不同特性与作用，推动故事内容与媒介、文体等形式跨媒介交融，从而通过故事的演绎增强故事世界的生动性，进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吸引力与影响力。

二、历史叙事：在展演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学史知理

历史是客观事物的存在方式，每一事物都在一定空间中生存，在一定时间内发展，事物的发展会表现为历史过程。历史叙事是将一切社会现象的产生发展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以历史和联系的眼光贯通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整个发展过程中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规律。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叙事不是把某个命题或概念直接呈现给受众，而是通过讲述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阐释历史发展事实、唤起历史记忆，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厚重感和解释力，从而实现“以史明理”、“学史知理”的目的。

（一）讲述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厚重感

以逻辑推演为主线阐释理论意在以理服人，增强逻辑推演的说服力，若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无法把握理论形成的发展过程，容易陷入孤立解读理论的困境。历史叙事可以还原理论得以生成的境遇，将理论对象化、场景化、过程化，从生成史的层面回答“理论何为”、“理论是何”。正如毛泽东所言：“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

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①因此,将主流意识形态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阐释理论形成的来龙去脉,能够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厚重感。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社会存在出发解释社会意识是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唯物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从想象的、设想的东西出发,而是从社会生活领域划分出物质生产领域,从社会生产关系总和中将生产关系作为决定性的关系,强调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出发去解释。意识形态是由社会生活决定的精神体系,从物质事实出发是认识意识形态的基础。主流意识形态不是“从思维到思维”的事情,不是躲在书斋里编造故事,也不是脱离社会现实的文学虚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创生和发展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是从现实依据出发,揭示主流意识形态得以形成的真实境况,对其进行历史地、联系地加以考察,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②。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生长背景的延伸,对其形成的过程加以还原、展开、重演和再现,也就讲清楚了这一理论体系形成的背景以及要解决的问题,从而也就能明白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质。

坚持长时段聚焦,在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辩证统一中讲清楚主流意识形态。“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③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脉络即是认识和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这就是把握了“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超越历史的抽象真理,不是将社会发展规律归结为超越历史的神秘命运,而是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把握规律,研究事物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特殊表现与特征,从而既揭示了每一阶段的特殊规律也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马克思坚持着眼于宏观历史进程,根据历史长时段的发展得出的结论。同时,马克思主义又伴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得到发展,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就是“理论逻辑”。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是从还原历史出发,把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结合起来,阐释理论发展的过程与理论的科学性与真理性。由此,重视理论生成的历史过程性,要求将中华文明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改革开放史等这些历史时段承接起来,加强不同时段之间转承启合过程的研究,进而突出这些过程的历史情节、历史任务,各个不同时段的社会矛盾等,在生动鲜活的历史叙述中把主流意识形态讲清楚、讲透彻。

坚持世界视野,以宽广的视角和长远的眼光把握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定位和价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看待文化问题,要将文化“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④，“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⑤。尤其是,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革命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版图,在世界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地位,成为影响国际格局的重要力量。中国正在日益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相反,发达国家内部矛盾重重,经济增长乏力,发展实力相对下降,世界经济中心呈现出“由西向东”、“东升西降”的变化。国际世情的变化反映到受众头脑中会形成疑难困惑。主流意识形态叙事要在宽广的国际视野下,将国际国内情况纵横比较,运用事实与案例等进行解疑释惑、明辨是非,引导受众正确看待当代中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3页。

④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页。

⑤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页。

国、客观认识外部世界。

（二）阐释历史发展的事实，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解释力

历史叙事之“事”强调事实，具有尚实性特征。在字源上，“事”与“史”相通。《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史，记事者也。事，职也。从史，之省声。”^①“史”与“事”密不可分，中国古代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说法。中国的叙事概念最初由“叙”和“事”构成，而“事”与“史”相连，中国的“叙事”更强调“叙史”。“史”的记录是以“实录”为原则，叙事具有“尚实”性。由此，历史叙事就是要求真实、实事求是地讲清楚事情的真相，不夸大、不伪饰、不美化、不造假，根据事件的真实性、可靠性、准确性来叙事。“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后面将对这一点作更清楚的说明——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②。从而，阐释清楚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下社会实践发展的事实，能够有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解释力。

具体历史事实能够为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提供印证、解释。毛泽东在讲如何打破反革命宣传时提出“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③。邓小平提出“用事实说话”的主张，“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义好，这样，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效”^④。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⑥，“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风景这边独好’。”^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伟大胜利，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根据一系列发展的事实来判断，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因此，讲清楚主流意识形态，就要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的伟大革命成果说话，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说话，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说话，这一系列发展事实为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提供了重要支撑。

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客观公正阐释历史事实，动态联系看待历史。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在“虚构化”、“娱乐化”、“时尚化”的话语包装下亵渎和虚无历史，恶意篡改历史事实，故意编造历史信息，随意丑化英雄人物等，其隐蔽性和毒害性影响不可忽视。客观、公正、实事求是阐释历史事实需要在纵向上把各个历史时段相联系，不能静止、孤立地看待历史，也不能割裂历史，用某一历史时段去否定另一历史时段，要在历史发展的连续中来把握。看待历史也需要在横向上把握不同事件的各种关联，在整体格局中认知历史。同时，要坚持辩证看待历史，认清历史发展主流与支流，不能以偏概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阐释历史事实如果仅仅限停留于表面现象的描述，以罗列和堆砌现象为满足，即使现象是真实的，也不能揭示事实背后的本质，不能达到说服人的目的。如果把事实作为零碎事例而把玩，止步于所谓的“细节真实”，不能把握事物的普遍规律从而形成

①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新订》，臧克和、王平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8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4—145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7页。

⑥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页。

⑦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0页。

真理性认识。

（三）唤起历史记忆，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说服力

历史叙事是保存传承记忆的有效方式。叙事具有建构意义的特性，将历史事件置于叙事框架中相互连接，通过对“事”的回忆与过去的“记忆”相连，因“事”的存在唤醒和勾勒出历史记忆，让“过去”为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提供说服力依据。

历史记忆附着并固化于一定载体之上，并借助于专门化实践得以传承和延续，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历史传递中不断被激活，发挥着建构意义与认同的功能。纪念活动是建构历史知识和强化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纪念对象代表着过去的历史，“通过描绘和展现过去的事件来使人记忆过去。它们重演过去，以具象的外观，常常包括重新体验和模拟当时的情景或境遇，重演过去之回归”^①。系列纪念活动是对纪念对象进行重申和重演，是保留民族、国家、政党历史记忆的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包括国家领导人的重要生平、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节日等纪念活动。系列纪念活动将许多人物、事件安排在一个时间序列中，以种种符号建构因果关联，唤起历史记忆，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作为历史记忆的承载物，如建筑、图像、书籍、档案等实体承载着当时当地当事人的史料，是历史的有力见证，也是唤起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古老的文物会给人一种枯燥、刻板的印象，仿佛遥不可及，与现实多有距离。然而，文物背后隐藏的故事，承载着历史的点滴。“物”是载体，“文”是中心，透过“物”看到的是载体，感受到的是历史的深度与温度。尤其是在一些纪念活动或展览馆中，选择有特定性质的“物”，依照时间、空间以及其他逻辑在展厅摆放，加上简单的文字解说，以传递社会所主张的历史与文化，从而唤起民族的集体记忆，构建国家认同。例如，《故事里的中国》努力还原真实历史场景，让故事里的每一个细节都在说话，每一个道具都在表演，每一个人物都真实而妥帖，每一处感动都自然而生发。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阁楼里的便携式的发报机、耳机、摩斯讯号的相关书籍、书桌上的水等都真实还原了地下情报员工作的场景。通过一系列布局，不仅重现历史场景，而且挖掘故事背后的历史印记，强化历史认同和国家认同。

三、情感叙事：在情理交融中实现由情入理

情感叙事着重观照受众的感性化心理诉求，“通过情感的共通建立起天然的联结，由情感的共鸣触发认知的共鸣，进而形成内化的认同”^②。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叙事是将情感嵌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实践，通过“陈情”和“说理”的交融，实现心理共鸣、情感认同和理论认同。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并以为人类求解放作为价值追求，具有真理性 and 道义性相统一的理论品质，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和胸怀人民的博大情怀，为实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情感叙事奠定了价值论基础。

（一）以情境渲染强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

情境是情感叙事的前提性时空场域，情感总是在一定的情境中产生。叙事者通过创设相关教育情境，构建故事吸引受众走进其中，跟随故事的进程以及自身的经验与愿望参与故事建构，促进受众的情感认同。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场景，以及对某一人物的局部特征、某一特殊场景甚至某一设备的具体而细腻的描述，都可以蕴含深邃的思想情感，从多个维度将他者与受众的个人体验、生活境遇相结合，使人有如身临其境之中，达致心理共鸣和情感认同。也就是说，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双方经由叙事运作共处同一情境，以境生情、以情感人、境生情、情入境，将受众的情

① [美]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90 页。

② 肖唤元、张茂杰：《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叙事策略审思》，《思想教育研究》2024 年第 5 期。

感、意志与故事背后的意义交流互动，使其在心理和情感上形成对故事内容的接受和认同。

数字时代为融合虚实情境、渲染情境氛围、强化情感认同提供了强大技术支撑。数字化构境融入影像、音频等各种符号，成为各种符号资源的动态有机整体。在数字叙事情境中，VR、AR、MR、XR等沉浸技术实现叙事场景革命，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全息影像技术、可穿戴设备强化具身沉浸体验，真实再现历史场景，实现传递、唤起和增强情感认同的目的。这样，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融合运用符号媒介，通过图像符号、声音符号、视图影像等精心布局，构建叙事再现情境，以符号编码形式再现党的伟大成就、展示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叙事受众沉浸其中，经由听觉、视觉等感官调动，激发心理共鸣和情感认同。如当下众多数字化展馆运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全景式VR数据采集和全比例场景复现，让受众完全沉浸于作品营造的情境氛围中，真实再现党的艰苦卓绝而又辉煌灿烂的奋斗历程，从而在情境体验过程中深化理论认同。

（二）以情感互动增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共识

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的过程是叙事双方交流沟通、互动共享的过程。只有加入互动才能构成完整的叙事过程。在叙事互动过程中，双方建立起共同的交往空间，在来回往复的谈话中产生情感体验。情感体验会左右人的选择和评价，形成接受与不接受、信任与排斥等判断。情感体验取向正向，会拉近叙事双方之间的距离，获得积极接纳态度；情感体验取向负面，会拉大叙事双方的距离，容易产生排斥对立的情感反应。在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过程中，叙事双方作为地位平等的主体，跳出“自我”与“他者”对立的窠臼，摆脱彼此从属的逻辑，致力于实现主体共建共在。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的条件下，人们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更加强调叙事双方在民主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双向互动的关系，在情感互动过程中实现意义生成和价值共识。因此，搭建情感互动机制，强化正向情感体验，至关重要。

以有效沟通助推情感互动。有效沟通是实现情感互动的基础和关键环节。情感互动是相互作用的过程，需要高度的互为主体性和良好的沟通机制，通过主体情感连接，唤起认知神经系统，形成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对象是具体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人不仅具有知性与理性，也具有本能、欲望以及情感等。在情感叙事过程中，要关注受众的情感需求，把握受众的情感偏好，增强受众的情感体验。例如，山东临沂一景区“跟着团长打县城”沉浸式影视体验项目爆火，从侧面反映了丰富多彩的情感体验和情感互动是越来越多受众“种草”红色经典的重要原因。与传统的观看红色地标与展览、聆听革命先辈故事等方式不同，“跟着团长打县城”在注重“红”的底色基础上，Cosplay当时场景，演员与游客们共同沉浸于攻城门、夺县城的文化体验中。这种沉浸体验方式，打开了情感叙事的新路径，既契合了受众多样化与品质化的情感需求，也实现了在有效沟通与情感体验中实现理论认同的目的。

以情感关爱强化情感互动。意识形态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带有情感的讲述能够拉近人与人的距离，打开心灵的枷锁，接受对方传递的信息，形成情感认同。脱离了情感的教育难以体现叙事的“暖意”、“情意”，难以让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叙事者可通过真性情、真感情、真关爱、真关怀激发叙事受众的积极情感体验，促进受众情感升华，在真心与真情中达成双方共情，实现以情动人的叙事效果。“真情才能感染人”^①。只有真情实感，既有“心入”又有“情入”，才能推动话语表达充满情感意味、真情实感、深厚情感，提升理论的接受度和认可度。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叙事包含着实质意义上的价值关切。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表明无产阶级立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实现了无产阶级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协调统一。中国共产党

^①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求是》2020年第17期。

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党性和人民性始终是统一的。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和人民在一起，党的立场就是人民的立场，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党的奋斗目标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可以说，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就是为了人民。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叙事要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精准把握时代变化和人民需求，将“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情感逻辑贯穿主流意识形态叙事过程中，阐明主流意识形态之于国家大事、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从而在个人与集体、社会与时代的互动中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与认同。

（三）以情感表达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共鸣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谁用情、如何用心”的情感要求，强调“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亿万人民心中，成为接地气、聚民智、顺民意、得民心的理论”的情感目标。“用情”、“用心”、“顺民意”、“得民心”意味着要将主流意识形态理论话语转化为人民群众能够愿意听、听得懂、听得进的叙事话语，通过富有情感的话语表达获得群众的情感信任和理论认同，实现以情感人和以理服人的有机统一。由此，创设叙事语境，畅通情感表达，是情感叙事的必要途径。

创设叙事语境，达成情绪共振，实现情感共鸣。语境是话语表达的环境。“在话语表达过程中，可以灵活地根据语境的变化、受教育者实际情况而顺应语境。同时，在一定的语境基础上，能尽快与受教育者的语境形成融合态势，以便能引发受教育者的情感、认知、心灵的共鸣与认同。”^① 叙事双方因身份、地位、阅历与环境等不同因素，会形成不同的认知系统，二者在话语表达过程中也就形成不同语境。语境是叙事表达和叙事接受之间的桥梁。因此，关注叙事双方的“和”与“同”，创设叙事双方共通的语境，畅通情感表达沟通的渠道，提高话语表达的准确率，减少语言交流障碍，能够唤起受众的同理心与理解力，增强叙事双方的理解与信任。母题即为有效例证，母题是文学学术语，“是文学历史进程中，不断被反复书写、表现的共同主题”^②，是人类共有主题，如亲情、爱情、友情、乡情、国情等。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可借助母题寻找与叙事受众共同的主题，从而引发心理共鸣。

畅通情感表达，将“受众想听的”与“我们想讲的”融合，实现“陈情”和“说理”结合，引发读者情感上的共通、思想上的共鸣。这就需要研究受众的情感规律、需求与特点，找准社会聚焦点、利益交汇点、情感共鸣点、话语共通点，开展深层次、多样化、重实效的情感表达。数字技术已经深入社会生活各领域，不仅可以实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情感表达，而且能够以技术手段作为基础介质开展情感分析，为畅通情感表达提供基础支撑。马克思强调，人是“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③，数字技术可将人的情感需求纳入话语生产与传播过程，将主流意识形态内容转化为浅显易懂、鲜活灵动的感性化话语和充满温度的视频影像，进而潜移默化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ChatGPT 等新兴技术可将用户在数字平台的浏览、点赞、转发等操作以数据形式纳入数据算法评估中，分析用户的情感偏向，精准捕捉用户的情感情绪，并将其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生产与传播中，用主流意识形态驾驭“算法”，唤起用户的情感认同和理论认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引领力。

① 李辉、黄英：《语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范畴》，《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 年第 19 期。

② 董学文、张永刚：《文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0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209 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一功能定位凸显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如何能够内化为人民群众的个体意识，外化为具体的实践行为，涉及主流意识形态“怎么说”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学史明理”等，明确了叙事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基本方式。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故事叙事、历史叙事与情感叙事构成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重要方式，三种叙事有机结合不仅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有趣性和主动性，增添了理论解释的厚重感和说服力，而且具备现实的合理性。当然，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是一个宏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仍需要立足国内与国际，针对不同领域不同主题以及不同群体展开更详细的针对性叙事研究。

责任编辑：马耀斌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offering critical insights into the rol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mpowering industrial advancement.

Key words: Real Economy and Digital Economy;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alizing Rural Migrants' Homestead Rights Under the "Three Rights Separation" Framework

Yu Fengrui(72)

Abstract: Safeguarding rural migrants' homestead rights under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remains a critical issue in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current voluntary and compensated homestead withdrawal system, designed to address the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for new homesteads and the underutilization of existing ones, lacks effective regulatory support and has yielded limited practical outcomes. The voluntary and compensated transfer of homestead rights responds to structural changes in rural society and evolving urban-rural relations, reflecting the policy goal of "granting farmers fuller property rights" and aligning with the "Three Rights Separation" reform. To realize homestead rights for rural migrants under this framework, it is essential to clarify the legal logic of voluntary transfer, re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ctive membership and homestead rights, leverage collective ownership to mitigate market limitations, and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system that ensures migrants' freedom to retain or relinquish homestead rights.

Key words: Rural Migrants; Homestead; Three Rights Separation; Membership Rights i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Constructing an Intelligent Processing Mechanism for Minor Criminal Cases Under Digital Empowerment

Cheng Xiao'ai(83)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lligent processing mechanism for minor criminal cases hold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Current rapid-processing mechanisms for such cases face challenges, including ambiguous case definitions, weakened prosecutorial functions, and superficial evidence collection and review. Given the large volume, repetitive nature, and relatively low complexity of minor criminal cases, intelligent processing can enhance case diversion efficiency, strengthen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and improve soci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Under digital empowerment, the mechanism should focus on six priorities: clarifying case scope with detailed substantive, procedural, and evidentiary criteria; refining evidence collection and review standards; adopting flexible case-handling timelines; establishing unified data-sharing and one-stop service platforms; standardizing workflows; and implementing oversight and incentive systems. This mechanism offers a novel pathway for efficient and equitable case resolution while advancing judicial digitization.

Key words: Digital Empowerment; Minor Criminal Cases; Intelligent Processing; Procedural Mechanisms; Case Diversion

Narrative, History, and Emotion: Practical Pathways for Mainstream Ideological Storytelling

Chen Sanbao(122)

Abstract: Integrating mainstream ideology with narrative practices involves constructing meaning through storytelling. Storytelling, 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emotional engagement constitute key approaches. In story narratives, embedding ideological messages requires metaphorical structures to build imagery, narrative frameworks to enhance vividness, and discursive techniques to ensure dynamism. Historical narratives achieve ideological clarity by recounting theoretical evolution, interpreting historical facts, and invoking collective memory to strengthen persuasiveness. Emotional narratives foster ideological resonance through contextual immersion, interactive engagement, and expressive articulation to cultivate value consensus. These pathways collectively advance the persuasive power and accessibility of mainstream ideology.

Key words: Mainstream Ideological Narratives; Storytelling; Historical Narratives; Emotional Narratives

The Pursuit of Work Value: Typologies, Logic, and Guidance Strategies for Contemporary Youth's Delayed Entry into the Workforce

Wang Xindi; Hu Penghui(161)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notion of "employment upon graduation" is being reshaped by internet technology, rising incomes, gig economy expansion, and emerging industries, leading to a delayed workforce entry trend among contemporary youth. This phenomenon manifests in three forms: flexible employment, slow employment, and full-time caregiving. Its emergence stems from dual material and spiritual support systems, structural pressures from perceived work meaninglessness, youths' emphasis on value-driven careers, and technology-enabled youth subcultures. To address this, a coordinated strategy involving schools, employers, and governments is proposed: universities should guide career planning; employers should adopt progressive talent development models; and governments should strengthen policy frameworks. Respecting youths' employment choices while providing structured guidance ensures informed career development during critical life stages.

Key words: Youth Employment; Delayed Workforce Entry; Youth Mentality; Youth Subculture